

族群政治视野下的埃塞俄比亚 犹太人移民

胡 浩 于金金

内容提要 在大规模移居以色列之前，埃塞俄比亚境内生活着大约 3 万名犹太人，他们自称为贝塔以色列人，关于他们的起源和种族属性存有不同说法。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以色列政府分别通过“摩西行动”、“所罗门行动”和“鸽翅行动”将几乎全部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接回以色列。由于种族、历史、宗教等方面的原因，回归后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在融入以色列主流社会进程中遭遇种种障碍，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均处于劣势，成为犹太人内部的一个相对边缘群体。尽管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社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和抗争，以色列政府也致力于改善其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但由于传统上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社团的强势地位以及以色列社会存在的顽固的种族偏见，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在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方面仍然面临着深刻的矛盾和困境。

关键词 族群政治 犹太人 埃塞俄比亚 移民 “摩西行动” “所罗门行动” “鸽翅行动”

作者简介 胡浩，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副教授、河南大学世界史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开封 475001）；于金金，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硕士生（开封 475001）。

现代以色列是一个十分典型的移民国家，其人口大部分是由犹太移民及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ZJ01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2YJC770022）、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2013M530336）阶段性成果。

其后裔构成。移民给以色列带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为以色列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随着大量移民的进入，以色列社会从经济地位、文化素养以及思想观念上越来越明显地分裂为三大群体：西方犹太人、东方犹太人、阿拉伯与其他少数民族，不同群体的分化与游离成为以色列国家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①对构建现代以色列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也产生负面影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属于东方犹太人的重要一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13年8月，在以色列政府的帮助下，大量移居以色列。不过，在成为以色列公民后，面对陌生的环境，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经历了艰难的融入进程，长期以来受到其他族群的歧视，不为主流社会所真正接纳。作为黑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的代表，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经历和遭遇实际反映了以色列社会非常复杂的族群关系和族群矛盾。

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历史及移民状况

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被当地人称为法拉沙人（Falashas），相当于流亡者或移民者，他们称自己为贝塔以色列人^②，自认为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代。^③在大规模移居以色列之前，埃塞俄比亚境内生活着大约3万名法拉沙人，^④他们是世界上唯一的黑皮肤犹太人群体^⑤。在历史上，由于他们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其他犹太人联系甚少，目前尚不清楚他们的起源。不过，绝大多数现代犹太学者相信，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起源在于从阿拉伯半岛渗入埃

① 张倩红著：《以色列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4~255页。

② “Beta Israel”，来源于希伯来语，英语译为“house of Israel”，意为“以色列之家”，“贝塔以色列人”就是指以色列家族的后裔。

③ Isaac Landman, ed., *The Universal Jewish Encyclopedia*, Vol. 4, New York: KTAV Publishing House, 1969, p. 234.

④ 关于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精确数字不得而知。18世纪初，苏格兰旅行者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估计当时约有10万法拉沙人，而传教士亨利·斯特恩（Henry Stern）在19世纪中叶估计有25万法拉沙人。20世纪初，法国教授雅克·费特罗维奇（Jacques Faitlovitch）声称有5万法拉沙人，但根据之后不久到达埃塞俄比亚的R. 哈伊姆·内厄姆（Hayyim Nahum）的说法，当时只剩下大约7000名法拉沙人。1949年，沃尔夫·莱斯劳（Wolf Leslau）估计当时的法拉沙人在1.5万到2万人之间。而据称1969年，法拉沙人的数量在2.5万到3万人之间，see Cecil Roth and Geoffrey Wigoder ed., *Encyclopedia Judaica*, Vol. 6, Jerusalem, Israel: Keter Publishing House Ltd., 1972, p. 1145.

⑤ 但文：《犹太黑人——法拉沙人》，载《世界知识》1985年第8期，第28页。

塞俄比亚的闪米特和犹太文化的影响，而非实际的移民。^①

根据埃塞俄比亚编年史记载，在阿克苏姆王国的埃赞那皇帝于公元 330 年皈依基督教之前，犹太教在埃塞俄比亚境内得到广泛传播。但王国基督教化之后，那些仍然信奉犹太教的力量受到迫害并开始从沿海区域撤退至纳塔湖北部山区，这些人专注于自己的宗教并在社团领袖的领导下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② 法拉沙族群自此形成并逐渐发展壮大，公元 7~8 世纪被认为是这个犹太文化种族集团自治时期，他们使用阿高语，与阿高人关系密切，并在 10 世纪阿高人反对阿克苏姆王国的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女王朱迪特的率领下，俘获了基督教国王，并焚毁基督教教堂。之后，由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势力的持续入侵，法拉沙人在埃塞俄比亚的生存和自治受到严重威胁。1270 年，自称是古代阿克苏姆王朝后裔的基督教精英重建了对埃塞俄比亚的统治，并决定镇压据称与埃塞俄比亚东南边境穆斯林王国关系密切的法拉沙人。在阿姆达国王（1314~1344 年）、以撒克国王（1412~1427 年）、雅各布国王（1434~1468 年）统治时期，都曾对法拉沙人进行较大规模的征服活动，基督教教堂在法拉沙人居住区广泛建立，很多法拉沙人被强迫改宗。^③ 16 世纪时，基督教国王萨尔撒·丹克尔（1563~1597 年）对法拉沙人大举挾伐，相继摧毁了法拉沙人的几个堡垒，杀死了 3 万多名法拉沙士兵。^④ 1616 年，苏斯尼约斯国王对法拉沙人再次发动进攻，拒绝接受洗礼的法拉沙人遭到屠杀，很多人被变卖为奴隶。此后，法拉沙人口锐减，被剥夺了大片土地，逃进荒凉的山地，社团自治和独立也由此走向终结。^⑤

近代以来，法拉沙人主要居住在埃塞俄比亚西北诸省，特别是塔纳湖一带的广大农村中，他们与非犹太人分开居住，在自己的村庄设置围墙，防御非犹太人，不允许非犹太人进入其中。法拉沙人曾建学校供年轻人学习《圣经》和其他宗教典籍，但在 19 世纪 30 年代教育设施遭损毁后，穷困使他们无力重建这些机构。因此法拉沙人的文盲程度很高。他们的职业主要集中在

① [以色列] 埃利·巴尔纳维主编；刘精忠等译：《世界犹太历史：从〈创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66 页。

② Cecil Roth and Geoffrey Wigoder ed., *op. cit.*, p. 1143.

③ *Ibid.*, pp. 1143-1144.

④ 但文：前引文，第 28 页。

⑤ Cecil Roth and Geoffrey Wigoder ed., *op. cit.*, p. 1144.

农业和体力劳动方面。^① 其男子大部分务农畜牧，个别人以织布、打铁为生，妇女制陶。他们同绝大多数埃塞俄比亚人一样，生活水平很低。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他们的政治地位更低，历史上一直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对待，曾多次受到当权者迫害，甚至被剥夺拥有土地的权利。^②

18 世纪以来，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兴起，西方探险家、传教士等陆续进入埃塞俄比亚，法拉沙人开始为外界所了解，西方犹太人也开始同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进行接触。但在许多年中，对于法拉沙人是否属于真正的犹太人问题，存在很大争议，尤其是在不同的犹太宗教权威之间。早在 16 世纪初，当被问到法拉沙人的犹太性时，埃及大拉比阿比·兹姆拉宣布，这些人是犹太人。1908 年，45 个国家的大拉比承认法拉沙人是犹太同胞。^③ 1934 年，第一批埃塞俄比亚犹太人随意大利厄立特里亚省的也门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并定居此地。1948 年以色列建国后，埃塞俄比亚的黑种犹太人给以色列、欧洲和美洲的犹太人写信求援，但是没有回音。从 1963 年到 1975 年，有一批规模较小的法拉沙人移民以色列。这批移民主要是在以色列学习或者通过旅游签证来到以色列，之后就非法滞留在此。以也门裔犹太人奥瓦迪亚·哈兹（Ovadia Hazzi）为首的一些以色列人认可这些人的犹太性，并且通过组织协会方式，帮助他们在以色列社会获得了正常地位。^④ 1973 年，哈兹正式向以色列的塞法迪大拉比奥瓦迪亚·约瑟夫（Ovadia Yosef）提出了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犹太性问题，这位拉比援引 16 世纪的一份拉比裁决，正式承认法拉沙人是古以色列人 12 支族之一“但”族（公元前 8 世纪为亚述人俘虏的以色列十大部落之一）的后裔，基于他们并未遵守犹太教全部礼仪的情势，向他们提出必须重新“皈依”犹太教的要求。1975 年，以色列阿什肯纳兹大拉比什洛莫·格伦对法拉沙人说：“你们是我们的兄弟，你们和我们有着共同的血脉，你们的确是犹太人。”^⑤ 随后，以色列内阁委员会宣布《回归法》^⑥ 适用于法拉沙人，法拉沙人开始移居以色列国。1977 年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

① Isaac Landman, ed., op. cit., p. 235.

② 黄陵渝：《非洲的犹太人与犹太教》，载《西亚非洲》2003 年第 2 期，第 75 页。

③ [英国] 阿伦·布雷格曼著；杨军译：《以色列史》，东方出版中心，2009 年版，第 216~217 页。

④ See http://en.wikipedia.org/wiki/Ethiopian_Jews_in_Israel, 2014-05-05。

⑤ [英国] 阿伦·布雷格曼著；杨军译：前引书，第 217 页。

⑥ 1950 年 7 月 5 日颁布，该法把居住在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称为“流散中的犹太人”，把移民以色列表述为“回归自己的祖国”，这样就赋予了每个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权利。

鼓励采取行动大规模接回法拉沙人。1984到1985年,埃塞俄比亚爆发严重旱灾,国内局势恶化,以色列政府实施“摩西行动”,以大规模空运方式,将上万名法拉沙人接回以色列。^①该行动目标是将8000多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从苏丹首都喀土穆经由比利时空运至以色列。于是,数千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先徒步逃往苏丹的难民营,然后陆续搭乘飞机离境。但是媒体报道此事后,阿拉伯国家向苏丹施加压力,要求停止空运。近1000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因此被留了下来,他们与仍然生活在非洲的家人失散。后在美国压力和经济援助的双重刺激下,到1985年3月22日,这近1000名犹太人终于从苏丹经由西欧国家转运至以色列。1991年,埃塞俄比亚内战期间,总统门格斯图在美国许诺给予3500万美元援助并力促政府与反对派和谈,以色列向埃政府提供了包括100辆“T-55”坦克以及埃空军所急需的零配件在内的军事援助后,同意以色列将聚集在首都亚得斯亚贝巴的犹太人空运回国。1991年5月,以色列政府动用40架飞机,在36小时内将14000多名犹太人转移到以色列,即实施“所罗门行动”。^②在“摩西行动”和“所罗门行动”中,被接到以色列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达2.5万。此后,埃塞俄比亚境内还生活着500多名外国犹太侨民,在首都亚得斯亚贝巴还有一个独立的犹太人社区。^③2011年7月,以色列政府决定实施代号为“鸽翅行动”的救援计划,旨在将留在埃塞俄比亚的最后一批大约7500名犹太人空运回以色列。因为甄别程序需要较长的时期,根据计划和安排,政府每月接运200名犹太人,耗资约450万美元,计划将于2014年10月结束。不过,在以色列政府的积极努力下,该计划最后提前完成。2013年8月29日,当载有237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飞机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着陆时,代号为“鸽翅行动”的救援接运海外犹太人的行动宣告结束。以色列犹太事务代理组织主席纳坦·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在“鸽翅行动”的庆功仪式上总结说,“这是一个历史时刻。该时刻从‘摩西行动’开始,接下来的是‘所罗门行动’,而高潮是‘鸽翅行动’……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正在书写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历史的最后一页。”^④

① 穰生编译:《秘密逃亡之旅——摩西行动的故事》,载《世界博览》1987年第5期,第14页。

② Stephen Spector, *Operation Solomon: The Daring Rescue of the Ethiopian Jew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

③ 李毅夫、赵锦元主编:《世界民族常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341页。

④ 徐新:《揭秘以色列鸽翅行动始末》,载《国际先驱导报》2013年9月25日。

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经3次大规模的救援行动最终完成回归，在以色列移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充实了以色列的犹太人口，还给以色列族群增添了多元性色彩。不过，这些本来过着中世纪般生活的黑皮肤的乡下人，突然被带进了由欧洲犹太人建立的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初时受到相当的歧视，面临诸多挑战。30年来，他们在以色列学习、适应、奋斗的过程是一次大规模的、活生生的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实验，也是真正地“游走于文明之间”。^①

重回故土后的社团生活

以色列政府在如何让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迅速融入以色列社会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当局为安置这批移民采取了多方面措施。首先，以色列政府专门设立了融合基地和学习中心，以接待到来的新移民。^② 80年代中期，当第一批埃塞俄比亚犹太移民刚刚到达时，以色列国内就设置了多处融合基地，将近3/4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被安排在基地居住。如在贝尔谢巴的基地，生活着500多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约有40名犹太办事处工作人员对他们予以指导。^③ 政府还向每个移民发放一笔钱，鼓励新移民到一些专门遴选出来的不发达城镇，如阿夫拉、伽特、阿什克伦、马拉奇、内提沃特、奥法基姆等地，以及其他一些正在发展中的城镇生活定居。^④ 其次，政府为新移民提供语言和生产技能方面的培训。在以色列，新移民融合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学习希伯来语，以色列政府在帮助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克服语言障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由政府设立的、专门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提供希伯来语培训的语言学习中心接收了大批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而且，以色列教育部门也注重在教材中加入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历史和传统，让其他犹太社团更了解这群神秘的同胞，以此来增强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自豪感。在部队中，这些来自东非的犹太人也会听到讲述自己祖先历史的讲座。主流媒体也加大了对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宣传。

① 光明网读书频道：《埃塞俄比亚犹太人》，http://reader.gmw.cn/2011-09/29/content_2717723.htm，2014-05-05。

② Brian Weinstein, "Ethiopian Jews in Israel: Socialization and Re-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Vol. 54, No. 2, 1985, p. 213.

③ Ibid., p. 216.

④ [英国]阿伦·布雷格曼著；杨军译：前引书，第218页。

不过,在经历了短暂的礼遇和接触新环境的兴奋期后,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发现以色列并不是他们梦想中的“耶路撒冷”,尽管他们的生活水平相比之前得到了提高,可是,如同在埃塞俄比亚一样,他们成为以色列社会的底层群体。由于种族和历史传统方面的原因,他们的犹太性遭到主流社会的非议和贬斥,在经济、政治、宗教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难题。

在经济领域,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充当的是附庸者的角色,几乎没有任何地位和发言权。由于长期生活在落后的农业社会,许多初来乍到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对发达的现代文明知之甚少,自然难以融入其中。^①同一时期到来的苏联犹太人由于人口素质较高,经历了短期的困难之后,大多数人都解决了住房和就业问题。而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却无力应对全新的环境,因而仍由政府各部门具体负责他们的安置工作。他们从事着最底层的工作,拿着微薄的薪水来养家糊口。2002 年底,以色列议会“收入不均调查委员会”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埃塞俄比亚犹太社团约有 8.5 万人,其中约 92% 从事低收入工作,他们连同阿拉伯游牧部落贝都因人和不从事工作的犹太教极端正统派教徒,共同构成了以色列的“穷人”阶层。作为东方犹太人,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大多空手而来,处于无功受惠的地位,多被安排在不发达地区或者大城市的边沿,在劳动力市场也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失业率远高于西方犹太人。^②随着外来劳动力的不断增多,以色列劳动力市场出现的种族歧视现象愈加普遍。2012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本土出生的以色列人的薪酬要明显高于来自阿拉伯国家和埃塞俄比亚的移民,而且收入差距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大。里雄莱锡安学院管理研究院(College of Management Academic Studies, Rishon Lezion)调查发现,在法律、工程和高科技等工资较高的行业中,本土出生的以色列人在工作第一年的薪酬要比外来移民高出 41%,十年之后将高出 64%。超过半数的本土出生的以色列人和苏联移民在考大学时,通常选择薪酬较高的热门专业学习,而选择这些专业的阿拉伯裔学生占 29%,埃塞俄比亚裔学生仅占 27%,这也影响了他们就业后的平均工资。目前,埃塞俄比亚裔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起步月薪为 1 430 美元,要比本土出生的以色列人和苏联移民低 27%。10 年之后,他们的月薪差距会拉大到 36%。以色列社会活动

^① J. Abbink, “The Changing Identity of Ethiopian Immigrants (Falashas) in Israel”,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Vol. 57, No. 4, 1984, p. 141.

^② 张倩红著:前引书,第 255 页。

家、参选工党国会议员的本-古里安大学教授尤西·约纳（Yossi Yonah）认为，以色列劳动力市场的确存在着老套的种族观念和排他现象。他指出，由于犹太民族曾经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因而在以色列劳动力市场存在的种族鸿沟现象不仅是极其恶劣的，也会影响以色列的长远发展，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来遏制这种社会鸿沟的扩大和蔓延。^①

在政治方面，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政治活动空间较小、政治参与能力较低、政治影响力非常有限。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普遍不懂希伯来语和英语，造成语言交流上的天然障碍，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参与以色列政治事务的能力。以色列从建国伊始就以英、美等西方国家为蓝本构建了西方式的政治管理体系，实行议会民主制，在这一政治体制中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均取决于他们的意志。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成批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涌入这个现代化国家试图融入这种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体制中去，并试图运用这种自己在其中毫无发言权的体制去保护自己权益的时候，所遭遇的困难可想而知。进入以色列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通常被安置在边缘地区的定居点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像首都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这些大城市很难寻觅他们的身影。政府的这种安排有着经济方面的正当考虑，但是也与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弱小的政治影响力有关。

目前，以色列国内大约生活着12万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②，他们虽然有着自己独特的诉求，但其天然的人口数量局限和政治素养缺失导致其很难在议会中拥有代表自己利益的席位，而影响政府政策向自我群体倾斜更是难上加难。在较长时间内，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没有自己的政党，尽管在自由党、前进党和沙斯党等主要政党中有少量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代表。而几乎是20世纪90年代同一时期来到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却表现出相当的适应性，很快融入以色列社会并且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性，甚至建立了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比如夏兰斯基创立的移民党、利伯曼创立的家园党和盖达马克创立的正义党最具代表性。^③2006年，亚伯拉罕·内古萨（Avraham Negusa）领导建立了主要代表埃塞俄

^① 引自国际在线专稿：《调查显示以色列劳动力市场种族歧视现象严重》，<http://gb.cri.cn/27824/2012/12/27/5892a3973281.htm>, 2014-04-15。

^② 2008年底的统计数字，其中有81000名埃塞俄比亚以色列人是出生在埃塞俄比亚的，而38500人（32%）是出生在以色列，<http://zh.wikipedia.org/wiki/贝塔以色列>, 2014-04-10。

^③ 周承：《以色列国内苏联犹太移民政党的成因及影响》，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8期，第24页。

比亚犹太人利益的政党“一种希望”(Atid Ehad), 该党支持将仍滞留在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接回以色列并致力于强化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社团的社会融合进程。该党参加了当年的议会选举, 赢得 14 005 张选票(约占总选票的 0.45%), 没有达到进入以色列议会所要求的 2% 选票的门槛, 因而未能在议会中获得议席。之后, 该党影响力进一步式微, 没有参加 2009 年的议会选举。^① 由于以色列实行的是比例选举制度, 这在很大程度上将作为少数民族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排除在议会之外。当他们意识到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不是发生在个体身上, 而是发生在整个社团身上时, 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就会被激发出来, 从而变得与其他社团格格不入, 这一状况也对以色列政治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不过, 近些年来, 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移民群体的政治意识也在不断觉醒, 并要求在政治上获得更加平等的地位和发言权。2010 年, 以色列议会决定在 2011 年专门为埃塞俄比亚移民分配 30 个政府部门职位。要看到尽管有 782 名贝塔以色列人在政府部门任职, 但这只占全部 61 000 名公务员的 1.4%。^② 2012 年, 以色列任命了该国历史上首位埃塞俄比亚裔的大使, 这在反种族偏见方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③

在宗教方面, 由于与主流犹太教存在较大差别, 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犹太信仰受到质疑, 宗教活动受到限制和歧视。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既不属于正统派, 也不属于保守派和改革派, 而是在非洲生活环境中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宗教生活。他们信仰犹太教, 信奉《圣经》, 是严格的一神论者, 所庆祝的节日(如逾越节和赎罪日)也与其他犹太人庆祝的节日很相似; 遵循传统的安息日礼仪和犹太教关于饮食的规定, 并行割礼。^④ 但由于地理隔绝, 其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与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已经有了很大区别^⑤。其最大的区别在于,

① [Http://en.wikipedia.org/wiki/Atid_Ekhad](http://en.wikipedia.org/wiki/Atid_Ekhad), 2014-04-15。

② Ruth Eglash, “Gov’t to Create New Civil Service Roles for Ethiopian Jews”, *The Jerusalem Post*, Nov. 28, 2010, 转引自欧连维:《“贝塔以色列人”研究》, 外交学院 2009 级硕士学位论文, 第 23 页。

③ Herb Keinon, “J’ lem appoints first Ethiopian - born ambassador”,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28, 2012.

④ Isaac Landsman, *op. cit.*, p. 236.

⑤ 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相信来世和死者复活, 他们作品中有关于伊甸园里义人得到报偿和恶人受到惩罚的描述。阿兰道夫(Ullendorff)认为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宗教是异教、犹太教及基督教信仰和礼仪的奇异混合。而约瑟夫·哈勒维(Joseph Halevy)以及其他一些研究者则对他们的犹太意识印象深刻。费特罗维奇(Faitlovitch)认为他们在种族学上属于犹太后裔, 并试图说服他们改变奇风异俗, 以更加接近传统犹太教。See Cecil Roth and Geoffrey Wigoder ed., *op. cit.*, p. 1149.

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犹太教经典只有《圣经》^①，而没有《塔木德》^②，也没有塑造现代犹太教的中世纪拉比评注，有人称之为“没有犹太教经典的犹太人”。这是因为他们在圣经时代就已经定居在了这块东非高原上，与其他犹太人处于隔离状态，所以在巴比伦时期形成的经典《塔木德》就一直没有影响到他们。

在具体宗教习俗方面，二者更是存在差别，与主流犹太社团相比更具独特性，如一般犹太人的安息日始自星期五的太阳落山，而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安息日则从星期五的中午就开始了；另外，这些“黑犹太人”的传统节日中也没有哈努卡节和普林节，而这两个节日在其他犹太社团中则显得比较重要。^③更糟糕的是，身处以色列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社团没有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其克色斯（Keses）原是社团的拉比和支柱，现在受雇于以色列宗教事务部，其中许多人也负责社团的宗教仪式，但不断受到正统派拉比的羞辱。正统派以以色列的宗教权威自居，拒绝承认克色斯为合法拉比，禁止他们主持宗教仪式，还剥夺了他们主持犹太婚礼的权利，但正统派自身又未能恰当地领导初来乍到、失去了方向感的埃塞俄比亚社团。这个与过去斩断联系的社团因此留下了严重的创伤，忍受着焦虑感和孤独感。许多新移民自杀了——这在埃塞俄比亚是闻所未闻的。^④社团成员甚至被要求改变宗教信仰中的一些传统习惯，一些所谓正统犹太教极端分子不相信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信仰真正的犹太教，认为他们只是在祈祷和葬礼方面和真正的犹太教有相似之处，想要他们更新其“与上帝的誓约”，即经历所谓的“基俞尔（Giyur）”^⑤重新皈依犹太教。^⑥这种被强迫的改变使他们觉得有失尊严，缺乏安全感。因此，在到达以色列开始了梦寐以求的生活之后，这些持有独特信仰的犹太人与他们的同胞之间在宗教问题上经常会发生矛盾和冲突。

① 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使用的《圣经》主要由《摩西五经》、《约书亚书》、《士师记》和《路德记》构成，《圣经》其他章节处于次要地位，《耶利米哀歌》不属于其正典的一部分。

② 虽然《塔木德》不是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经典，但人们从他们记述的作品中能够发现某些与《革马拉》和《米德拉西》相一致的传统。See Cecil Roth and Geoffrey Wigoder ed., op. cit., p. 1147.

③ Brian Weinstein, op. cit., p. 214.

④ [英国]阿伦·布雷格曼著；杨军译：前引书，第218页。

⑤ 指非犹太人或未经正式皈依的犹太人要成为犹太社团的正式成员必须经过的皈依犹太教的一整套程序。

⑥ 李伯重：《黑犹太人来以色列》，载《世界知识》1989年9月，第10页。

社会融合、族群偏见与认同困境

1948 年 5 月,以色列建国时发表的《独立宣言》宣称:“以色列国……将以先知所憧憬的自由、正义与和平作为立国基础;将保证全体公民,不分宗教信仰、种族与性别,最充分享受社会政治的平等。”^①这一理想固然崇高,但实现起来并非易事。对建立在异族土地上的移民国家以色列而言,在其疆域内通过共同的语言、文化、价值体系等纽带,形成统一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和民族认同,即构建一个统一的国族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程。^②在以色列生活的犹太人或者他们的先辈来自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背景,虽然同属犹太人,但是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体系、职业甚至外貌都存在巨大差别。怎样有效地整合这些千差万别的犹太人,使他们重新成为一个共同的犹太民族便成为历届以色列政府的一大要务。以色列自建国以来,为弥合不同族裔之间的隔阂,整合不同背景的移民群体,强化国家意识和犹太认同,政府强力推行以同化思想为基础的“熔炉主义”政策,该政策主张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犹太各族群之间在社会结构上的完全融合。这是一种在承认多民族文化的前提下,提倡各民族文化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民族政策。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国家利益。^③本-古里安曾这样描述道:“我们必须把这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融化掉,在复兴民族精神这个模子里重新加以铸造”。为缩小东西方犹太人之间的差距,政府积极采取各项政策和措施,如在生活补贴、就业、教育等方面给予前者以照顾、有意识地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混合居住,扩大并鼓励不同定居点之间的经济往来与社会、文化交往等来解决新移民带来的问题,虽有一定成效,但远未达到族群有机融合的目标,因为社会融合是一项极为复杂而漫长的工程,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④

更为重要的是,以色列社会是一个西方文化占据主流的社会,这与来自欧洲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以色列社会中的强势地位密切相关。以色列社会

① 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130页。

② 李志芬:《主体民族主义与国族构建的悖论——以色列民族政策思想之评析》,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7期,第46~47页。

③ 周平著:《民族政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④ 张倩红著:前引书,第256页。

的经济运行模式、政治架构、社交模式、价值观念、文化氛围等都带有非常浓厚的阿什肯纳兹色彩。所以，“熔炉”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以色列社会事实上将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默认为在文化传统、社会组织、经济活动、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堪称楷模的“标准族群”，其他族群都应当在各个方面向这个“标准族群”靠拢，并逐步使自己全面融入这个标准族群之中。在完成同化过程之前，主流社会对属于非“标准族群”的文化传统、母语、社会习俗等实际上采取的是不赞许甚至排斥、歧视的态度。^① 具体来说，以色列的熔炉主义以阿什肯纳兹人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充分体现先驱、开拓精神的“萨布拉”（Sabra）^② 认同为基础，试图对广大来自亚非世界的东方犹太人进行同化，以消除他们身上落后的流散地文化特征，使他们融入以阿什肯纳兹人为代表的主流社会之中。

在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时代，以色列的族群更趋多元，政府也认识到文化多元主义的现实及“熔炉”政策的缺陷并试图进行调整，由消除多元文化差异转变为保护和发展多元性趋势，但在族群力量极不平衡的以色列社会，族群政治权力格局呈现相对固化的倾向，实现上述转变尤为不易。在存在主体民族（族群）数量优势的情况下，缺乏专门保护少数民族（族群）个体和群体的制度和措施，就不能保证所有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基本人权，而且很容易导致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族群）的强制同化。^③ 按照以色列学者阿萨德·格哈内姆（As'ad Ghanem）的观点，以色列的族群政治体现出典型的阿什肯纳兹中心和非阿什肯纳兹边缘的特征，政治上的控制和霸权体制被阿什肯纳兹精英用于对付在地域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次级群体及其精英。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所建立的“霸权种族国家”机制对于他者，即非阿什肯纳兹群体实行歧视政策，并且创造权威和社会机器来合法化种族依附关系，甚至使这种依附关系凌驾于一般民事关系之上。^④ 这样，尽管民族融合政策的初

① 马戎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6页。

② 指出生在以色列的犹太人。这一术语开始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指的是出生在委任统治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而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则习惯上指任何出生在以色列国家的犹太人。文化上的“萨布拉”观念强调的作为早期创业者的老一代欧洲犹太移民及其后裔对以色列的突出贡献以及由此带来的优越感，并倾向于弱化新移民和其他族群影响。

③ 王建娥：《族际政治民主化：多民族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载《民族研究》2006年第5期，第7页。

④ As'ad Ghanem, *Ethnic Politics in Israel, The margins and the Ashkenazi cent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reface.

衷在于促进民族平等以及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而不要求建立统一的国民文化，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制，常常以牺牲少数族裔的政治权益和文化个性为代价。因为每一个政府在制定自己的族群政策时，必须要考虑到本身的族群基础和各个族群对政府的支持程度，考虑到各族群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①

由于来自极端落后地区、社团规模较小、受教育水平不高、从事一些低级职业、社会地位低下、生活方式较为封闭和传统，又长期与世界其他犹太社团脱离联系，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与主流社会的接触和交流方面存在问题，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社会融合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② 尽管以色列政府在不断致力于改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但在以色列社会，他们始终未受到主流族群的尊重和平等对待，面临着深刻的认同困境。以色列原有居民对新来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存有严重的排斥心理。为了维护定居点附近的原有居民的利益，许多地方官员对于混合定居点建设采取了不合作甚至是抵抗的态度，其间夹杂的是对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文化习俗、历史传统、种族特征等方面浓厚的厌恶情绪。杜伦达·奥雅奴加在 1992 年进行的针对埃塞俄比亚在以色列的生活状况问题的调查研究显示，在以色列其他犹太社团中广泛存在着对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歧视和偏见。^③ 以色列的一些主流媒体也曾发表过不谨慎言论，过分地宣布法拉沙人“浑身是病”，尤其是艾滋病。当然，对于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厌恶和抵制不是特例，它反映的是西方犹太人对东方犹太人的较普遍观点和情绪。很多西方犹太人认为，来自落后的东方社团的犹太人会成为社会进步的负担，会削减以色列的“西方化”构造而使其成为“中东特征”的国家。^④

对于以色列族群之间交往意愿的调查显示，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仅仅高于以色列阿拉伯人，而且更多的人是不愿意与这群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黑犹太人

① 马戎著：前引书，第 504 页。

② 李志芬：《以色列民族构建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年，第 114 页。

③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犯罪率较高。在以色列军队中，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约占 3% 的比例，但在军事监狱中关押的比例却高达 13%。目前，以色列军队正寻求在两年内减少关押 15% 的埃塞俄比亚裔犹太士兵以支持埃塞俄比亚犹太社团的发展。See Gili Cohen, "Israeli Army Hopes to Reduce Arrest of Ethiopian Soldiers by 15 Percent", *Haaretz* (《国土报》), December 5, 2013, see <http://www.haaretz.com/news/diplomacy-defense/.premium-1.561870>, 2014-04-15.

④ 张倩红著：前引书，第 255 页。

发生工作或者生活上的关系，如作为邻居、同事、老板。^① 对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族群偏见和歧视也可以从这一族群与以色列其他族群的通婚情况看出来。200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在过去几十年，以色列的跨族群婚姻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并逐渐缩小了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与塞法迪犹太人之间的社会经济鸿沟。但是，埃塞俄比亚以色列人的婚姻状况并不符合这一总体趋势。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报告，大约有90%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93%的男子和85%的妇女）选择社团内部通婚。以色列学术研究中心2008年的调查研究称，大多数以色列的受访者认为，如果他们子女当中有一个人未来要和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结婚，他们会感到不舒服。57%的受访者对未来他们的女儿嫁给埃塞俄比亚裔犹太男子完全不可接受，而39%的受访者也不赞同他们的儿子娶埃塞俄比亚裔犹太女子为妻。以色列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协会副主席阿维·马斯费恩（Avi Masfin）指出，与其他族群通婚的障碍事实上是来自双方面，无论从以色列社会的普遍立场，还是从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自身的立场来看，乐于接受族际婚姻仍然需要时间。埃塞俄比亚犹太社团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这一问题上保守的，并且存在种种担忧。^②

受以色列社会对待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态度的影响，以色列政府曾试图控制埃塞俄比亚犹太移民的生育水平以限制其人口增长。2013年初，媒体报道，在过去10年中，以色列的犹太事务局（JAFI）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形下，强制让过渡营中移入以色列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妇女注射长期的避孕针，造成近10年以色列境内的埃塞俄比亚裔犹太妇女生育率降低50%，此事公开之后引发普遍关注、争议和谴责，被认为是带有种族歧视甚至于类似种族灭绝的举动。

主流社会对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种种非难和指责有历史和现实方面的原因，由这些非难和指责发展出来的种族歧视思想，给埃塞俄比亚犹太人造成强烈的种族低劣感和自卑感。为了获得更好的职业机会和更多的社会认同，有些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尝试改变其种族特征。

当然，在被动适应的同时，这个古老的犹太社团也开始不断发出抗议的

① 欧连维：前引文，第26页。

② Ofri Ilani, "Survey: 90% of Ethiopian Israelis resist interracial marriage", *Haaretz* (《国土报》), Nov. 16, 2009, see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news/survey-90-of-ethiopian-israelis-resist-interracial-marriage-1.4115>, 2014-04-15。

声浪。1996 年，以色列媒体曝出红色大卫盾组织（Megeen David Adom）^① 秘密丢弃埃塞俄比亚犹太移民及其后裔所捐血液以防止乙肝、艾滋病毒的传播和感染的丑闻。据称，通过对 5 200 名经由“所罗门行动”来到以色列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移民的医学检测，显示有约 2.3%（118 名）的艾滋病毒携带者。^② 此事引发了轩然大波，几天后，上万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聚集在以色列总理府前示威并向警察投掷砖头、石块等，警察使用橡胶子弹、水枪、催泪瓦斯等驱散了示威人群，示威最后造成 41 名警察和 20 名示威者受伤，同时有 200 辆总理府雇员汽车被损毁。在公众的抗议声浪下，红色大卫盾组织的执行主席被解职，政府专门成立了调查委员会调查此事并发布了调查报告，认为未发现种族主义，但要求在政策上做出调整。2006 年 11 月 6 日，在得知以色列卫生部决定继续实施批量丢弃包括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在内的高风险人群所捐血液的政策之后，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再次举行抗议活动，并试图阻断通向耶路撒冷的道路，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③ 2012 年 1 月 18 日，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抗议以色列社会针对其社群的肤色歧视及其在各方面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超过 5 000 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参加了这次示威活动。^④ 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这次大规模抗议活动是这一社团移居以色列以来所积累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的总爆发，实质上反映了东西方犹太族群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

综观以色列社会，埃塞俄比亚犹太人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个案，而是在以色列故土生活的多个犹太社团的共性问题。以色列政府所实施的融合政策具有塑造统一的国家民族认同和社会性文化的崇高理想，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以色列族群和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以优势族群的文化模式为样板，以消除和牺牲弱势群体的文化权益为代价的族群整合政策，客观上产生了族群分层、分裂与族群文化认同困境这一事与愿违的结果，给少数族裔造成了难以

① 以色列国家医疗急救和血液储备组织，2006 年被国际红十字会成员认可为以色列国家急救协会，并成为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成员。

② [Http: //en. wikipedia. org/wiki/Ethiopian_ Jews_ in_ Israel](http://en.wikipedia.org/wiki/Ethiopian_Jews_in_Israel), 2014 - 04 - 10。

③ The Associated Press, “Ethiopian - Israelis Clash with Police, Disrupt Jerusalem Traffic over Discarding of Donated Blood”, November 6, 2006. [http: //web. archive. org/web/20080620044718/http: //www. iht. com/articles/ap/2006/11/06/africa/ME_ GEN_ Israel_ Blood_ Protest. php](http://web.archive.org/web/20080620044718/http://www.iht.com/articles/ap/2006/11/06/africa/ME_GEN_Israel_Blood_Protest.php), 2014 - 04 - 16。

④ 《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抗议肤色歧视》，载新华网：[http: //news. xinhuanet. com/gongyi/2012 - 01/19/c_ 122606391. htm](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2-01/19/c_122606391.htm), 2014 - 03 - 10。

磨灭的文化和心理创伤，并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同化的进程，最终不利于锻造一个统一的以色列民族。虽然从结果上看，东方犹太人可能文明化了、进步了，但这是以他们抛弃传统文化，并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为代价的，因为在经济方面从事着低收入、低技术的服务业和农业生产，政治方面面临着自己不熟悉的西方式民主政治体系，宗教文化心理上又同主流族群存在明显差异，面对着各种歧视，他们很难真正抛弃自己长期的传统，融入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以色列社会中去。^① 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在移民以色列后，在以色列的国家政策和复杂族群关系的影响下，未能在国家（民族）认同和本社团认同之间实现有机的统一，相反，两者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疏离。

多民族（族群）国家社会整合的目标和出发点应该是求同存异，在承认差异、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创造一种具有更大包容性的制度空间，使各个民族（族群）都可以在不损害他族生存和利益的前提下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且在保持传统的族裔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大包容性的政治认同。^② 这种多层次的身份认同涵盖个人对特定族群的认同、个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特定族群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当然民族国家对个人权利和特定族群权利的认可与保护是实现上述多层次认同的基础。因此，从族群政治的角度来看，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实现真正地融入有赖于以色列政府调整其族群政策，真正尊重并重视少数族裔的利益诉求和文化传统，在民主的框架下实现各族群全面的政治参与。族际政治民主不失为以色列处理复杂的族群关系的有效途径。受到苏联解体后大量俄罗斯移民涌入以色列，全球多元文化主义所带来宗教力量复兴、女权运动发展及族群权利伸张等因素的影响，以色列国家维持稳固的单一族群主体意识和文化主体意识变得越来越困难，文化认同日益模糊和碎片化，文化思潮的多元化也成为以色列社会所遭遇的主要问题，包括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在内的东方犹太人的族性文化正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公民权和政治参与意识也空前增强，^③ 以色列政府正逐步调整自己的族群政策和文化政策，在坚持国家政治法律一体和主流文化（希伯来语、犹太文化、西方世俗价值观）普遍性基础上，尽可能地给少数族群参政创造机会，不同程度地允许少数族群保留自己的文化

① 李志芬：《以色列民族构建研究》，第115页。

② 王建娥：前引文，第3页。

③ 张倩红、艾仁贵著：《犹太文化》，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9~330、322~324页。

特征，同时也有意识地淡化和模糊各个种族、族群之间的边界，鼓励族际婚姻，并以多种方式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融合，从而使得政府职能在宏观上适应并驾驭多元社会的运行机制，以此来求得平和、稳定与发展。

On Ethiopian Jewish Immigr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 Politics

Hu Hao & Yu Jinjin

Abstract: Nearly 30, 000 Jews lived in Ethiopia before mass immigration to Israel. They call themselves Beta Israel,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their origins and ethnic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mid - 1980s, “Moses Action”, “Solomon Action” and “Operation Dove’ s Wings” taken by Israeli government airlifted almost all of Ethiopian Jews to Israel. Due to ethnic, historical and religious reasons, Ethiopian Jews who returned to Israel, when trying to integrate into Israeli mainstream society, had many disadvantages in terms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 and became the marginalized groups in Jewish society. Ethiopian Jews struggled for their rights, and Israeli government also took som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and social status, however, due to the traditional strong position of Ashkenazi Jewish Community and obstinate ethnic prejudice existed in Israeli society, Ethiopian Jews still faces serious 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s in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 Ethnic Politics; Ethiopian Jews; Immigration; Israel; “Moses Action”; “Solomon Action”; “Operation Dove’ s Wings”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